

# 康雍時期西行士人的西域感知與詩文創作

吳華峰\*

**摘要：**康雍時期用兵西北，清代的西域詩文創作也隨之拉開序幕。親履西域的士人以自己的實際人生經歷與獨特情感體驗，去感知並描述西域的歷史、自然、地理與文化景觀，由此抒發國家一統、內外無殊的豪情。他們突破了清初士人對西域的模糊認識與地域局限，因而其作品也更多地呈現出強烈的紀實特徵，既與前代西域詩文創作一脈相承，同時又和清代西域經營的歷史過程、現實背景緊密結合，開啓了並奠定了乾隆中期以來西域詩文創作的內容與抒情範式，具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。

**關鍵詞：**康雍時期；士人；詩文創作；西域感知

## 一. 引言

清初士人對西域的認識自上而下都是比較模糊的<sup>1</sup>。造成這種認知狀態的原因主要有二：其一，對前朝實際疆域與西域觀的承繼。明朝永樂年間建立哈密衛，與河西諸衛構成西北地區防禦體系。但迫於西北蒙古遊牧勢力的壓力，自仁、宣二朝開始在北部邊疆採取收縮政策，最終於嘉靖八年（1529）棄置哈密<sup>2</sup>，始建於明洪武五年（1372）的嘉峪關就成爲「限隔華夷」的實際地理界標<sup>3</sup>，這種形勢一直延續到清代。其二，明清鼎革之後，清朝推行統治的主要矛盾和阻力都來自南方。從滅亡南明，到康熙二十年（1861）平定「三藩之亂」，一系列的政治軍事行動都在中國南部展開，相較而言，北

---

\* 吳華峰，新疆師範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。

1. 中國古代的西域範圍時有不同。榮新江：《西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》指出西域概念「有狹義和廣義兩種。狹義的西域，一般即指天山以南，昆侖山以北，葱嶺以東，玉門以西的地域；廣義的西域，則指當時中原王朝西部邊界以西的所有地域，除包含狹義的西域外，還包括南亞、西亞，甚至北非和歐洲地區。」《歷史研究》，1998年第2期，頁132。星漢《清代西域詩研究》認爲「廣義的西域可至中亞、南亞各地。狹義的西域則指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及其附近地帶。」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1。本文根據康雍時期西北邊疆的實際形勢，所論範圍以嘉峪關爲界，囊括嘉峪關以西地區及新疆全境。與此相應，文中所使用的清代「西域詩文」「西域詩」等概念，也具有嚴格的地域性指向，同時專指親履西域的士人們的詩文創作，而不包括未至西域但在創作中使用與西域相關意象的作品。
2. 參施新榮：《明代西北地緣政治之演變》，《文史雜誌》，2011年第2期，頁148-153。收入施氏著《吐魯番學與西域史論稿》，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，頁87-105。
3. 《明經世文編》卷二七四，中華書局，1962年，頁2889。

方政局則暫時緩和。所以在文學創作中，也很少有人關注和描寫西域。

康熙二十九年，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入侵至烏蘭布通，引發清、準之間長達三朝的戰爭，清朝由此將國家經營的戰略重點聚焦於西北<sup>4</sup>。在這一進程中，清人對西域的認識慢慢發生改變，逐漸經歷了由淺入深的重構。康熙五十四年，準噶爾部首領策妄拉布坦遣兵兩千襲擊了時已歸附清朝的哈密<sup>5</sup>，清朝授富寧安為靖逆將軍，由西路出兵進駐巴里坤禦敵，清準前線推進到了西域。以此為起點，大量作為官員、幕僚的士人首次遠涉嘉峪關外，將他們對西域的歷史、地理與文化感知訴諸詩文。其中有作品傳世者，有張寅（1670—？）、岳鐘琪（1686—1754）、阿克敦（1685—1756）、方觀承（1698—1768）、方正瑗（1687—？）、丁棻（？）、沈青崖（？）諸人，留存於今的作品雖然數量有限，但卻以其全新的內容和強烈的紀實特徵，揭開了清代西域詩文創作的新篇章<sup>6</sup>。

## 二. 歷史記述與相關情感表達

康雍時期的西域詩文創作，是在清朝與準噶爾之間軍事角逐的現實背景下同步出現並展開的。除了相關西域歷史典故的追溯和典型意象的運用，此期西域詩文創作的重要主題之一，是對平準戰爭中史事的記述。不過由於作者們的身份差異和參與時間的先後，他們的敘述視角和作品內容又各具特色。

在這些作者當中，岳鐘琪地位最獨特。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清朝再次分西北兩路征討準噶爾。「丙辰，命領侍衛內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，北路出師。川陝總督三等公岳鐘琪為寧遠大將軍，西路出師」。岳鐘琪駐軍巴里坤後，「築東西兩城，蓄糧屯兵」<sup>7</sup>，以伺機進兵。他於軍機閑暇之餘，留下了最早對西路軍營的吟詠：「列灶沙關外，營門淡晚煙。月光斜照水，秋氣遠連山」「地在乾坤內，人居朔漠間。日寒川上草，松冷雪中山。鐵騎嘶沙磧，金戈擁玉關。」（《軍中雜詠二首》）<sup>8</sup> 岳鐘琪久歷行伍，此行又身負朝廷重托，躊躇滿志，因以詩歌切實描寫西路軍軍威嚴整之勢，藉此襯

---

4. 厄魯特蒙古於16世紀分為準噶爾、和碩特、杜爾伯特、土爾扈特四部。後準噶爾部強盛，排擠、兼併其他諸部，清代常將厄魯特蒙古統稱為準噶爾。康熙二十七年，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向康熙提出「聖上居南方，我居北方」的要求。二十九年，噶爾丹與清軍會戰於烏蘭布通。此後康熙帝於三十五年、三十六年兩次親征，噶爾丹兵敗自殺。至策妄拉布坦統治時期，準噶爾部進入全盛，與清朝關係再度破裂，雙方戰和不斷。乾隆二十年春，清朝兵分兩路征討準噶爾，擒獲首領達瓦齊。歷時康、雍、乾三朝的清準戰事方告結束。

5. 康熙五十四年前，在清廷與準噶爾接觸過程中，也有官員、隨軍幕僚、使者留下行紀與詩文，如康熙二十九年馬斯哈《塞北紀程》、康熙三十五年殷化行《西征紀略》、宋大業《北征日記》、余宗《塞程別記》等，這些作品描寫的多為寧夏、蒙古一帶的情形與聞見，未至西域。

6. 今人對此期作家作品的研究，主要有星漢《阿克敦〈奉使西域集〉論略》，《滿族研究》，1989年第4期，頁57-62；金燾方《阿克敦的〈邊塞詩〉》，《滿族研究》，1986年第1期，頁38-42；星漢《清代統一西域前軍營僚屬詩作論略》，《西域研究》，2016年第2期，頁114-119。星漢《清代西域詩研究》第三章《清代統一西域前的詩作》，頁36-54。

7. 《清世宗實錄》卷七九「雍正七年三月丙辰」條，第8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36。

8. 岳鐘琪：《岳容齋詩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496-497。

托自己「樓蘭誠狡黠，不滅不生還」的壯懷。

稍後登場的是幕僚文人丁棻和沈青崖。雍正十年清準議和，川陝總督查郎阿接替岳鐘琪署理寧遠大將軍，蘇州人丁棻以州同知參幕府事務至巴里坤，他的《巴里坤南山運道記》記載了清軍在停戰期間，修築哈密至巴里坤山道，以通糧運的前因後果：

先是，大將軍以制軍籌餉於酒泉，輪轅相接，至南山而闕，必紆道以達於軍。八月以往，冰雪載途，則積哈密，以俟春輸。僕夫苦之。大將軍久屬意焉，稽諸地圖，詢諸輿人之口，率未敢輕議。壬子，既承天子命統軍巴里坤，逾南山時，雪深於人，不能以措足。大將軍曰：「從者且爾，謂執輿者何」？於是相度其上下，有成算。

文章最有特色之處是對道路修浚過程的描述：「浚者曲之，疏者築之，隘者輔之。竣之溝以備其沖，架之梁以平其險，凡數十盤而後上，周之以回欄，穩之以喬木，不兩月而工竣，化竣阪為康莊矣。」<sup>9</sup> 全文文辭簡約而生動，且所載查郎阿修道運糧的內容，也可補其他史料記載之闕。浙江嘉興人沈青崖，於雍正十一年以西安糧鹽道管理軍需庫務時遠至哈密。他的《西路從軍樂》組詩亦專注於描寫清軍調整戰略、鞏固塞防的各種舉措。如「斥埃森嚴遍打班，先鋒報敵匿前山。指揮兩翼圍將去，釜底游魚系頸還。」（其三）自注稱：「十一年秋，大將軍查大冢宰親尋卡路，獲賊五十餘人，斬馘極夥。」<sup>10</sup> 係寫西路駐軍防範嚴密，將軍親自巡查台卡之舉。「仁君字小愛黎元，族帳移回吐魯番。新築瓜沙豐水草，一般城堡樂田園。」（其六）<sup>11</sup> 乃記錄肅州維吾爾族遷回吐魯番故居，從事農業生產之事。「夏衣才送又冬裘，縫綴無勞戍婦愁。」（其九）「關中才造劈山雷，粵嶠還馱九節來。」（其十四）寫清軍後方的軍資供應。「材官奇伎集京城，六郡良家勇健營。免胄喜教鳴鏑射，聳肩偏向石頭迎。」（其十二）寫軍隊較藝與人才選拔。涉及到軍營生活的各個方面。沈青崖將親履西域的實際見聞連綴成篇，不僅體裁創獲頗多，也打破了傳統邊塞詩多描寫厭戰、思鄉情緒的模式化格局，取材平凡而真實，令人耳目一新，故沈德潛評價該組詩即稱：「切定本朝西陲，不作泛常塞下曲，是作者獨到處。」<sup>12</sup>

雍正十一年七月，內閣額外學士阿克敦與侍郎傅鼐等出使準噶爾，商議罷兵息民及劃分遊牧範圍事宜。阿克敦一路行吟，以韻語形式記載了此行的諸多歷史細節。如《伊犁除夕》一詩刻繪在伊犁的年夜景象與返程安排：「柳牆殘雪白，毳幕客燈紅。風景他

9. 丁棻：《巴爾庫爾南山運道記》，《乾隆重修肅州新志》，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甘肅府縣志輯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424。

10. 沈青崖：《寓舟詩集》卷四，乾隆十三年刻本，葉三正一葉四正。

11. 為躲避準噶爾侵擾，康雍時期吐魯番維吾爾族屢次內遷。《乾隆重修肅州新志》載：「雍正四年，侍讀學士顧魯招出頭目拖克拖馬木忒等六百餘人安插威虜堡。九年。……回目額敏懇請內附，移於瓜州，築堡授田以安插之。」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甘肅府縣志輯》，頁427。

12. 沈青崖：《寓舟詩集》卷四，葉四正。

鄉異，年華此日同。明春新月上，馬首好行東。」自注云：「噶爾丹策凌有月上送行之語。」<sup>13</sup>《準噶爾使者》記錄準噶爾部派使者隨同入京一事：「綠衣花滿稱身裁，萬里行隨使節來。」題下自注稱：「噶爾丹策凌以吹那木喀諾揮泥充使者入貢。」<sup>14</sup>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《準噶爾歌》這首長篇古體，全詩追溯了準噶爾部的淵源及策旺阿拉布坦興兵肇端的過程，詩句下以夾注形式對相關史事進行了補充或闡述。如「元祚寢衰帝北狩，一傳再傳不自持。額參強盛收蒙古，土木之變是所為」句自注云：「額參太師者，噶爾丹策凌之先祖，明正統之蒙塵，乃額參收蒙古以後事，今蒙古紀載甚詳，《明史》曰：『也先，蓋漢譯番言，額參之誤也。』」「聖祖納降誅有罪，噶爾丹滅無子遺。兄子策旺遁西域，苟安於世飾詐欺」句注語稱：「策旺阿拉布坦者，噶爾丹之侄，噶爾丹娶其母，而殺其弟，故遁走西域，收敗亡之餘卒，取回地以成國。」<sup>15</sup> 這些歷史記述不如正史所載嚴謹，但卻代表着清初一般士人對於準噶爾部的瞭解，也顯示出在清代西域經營政策驅動下，親歷西域者主動認知異域的實踐。

以上諸人諸作，都聚焦於一時一地一事的片段性場景描寫，但合而觀之，則構成康雍時期清準之間由戰到和的歷史細節及其文學史書寫，內容極具現場感。與面向現實的歷史關照相呼應，在這些作品中所折射出的作者心態也出現根本性的變化：即一改以往出塞者的悲涼低沉，激越昂揚的情感表達成爲主流。這些都是歷史文獻中所不載的。

從早於岳鐘琪的張寅開始，這種表情特徵就已經非常明顯。張寅是現知清代最早進入西域且有作品傳世者。其《西征紀略》交待了自己出關的緣由：「康熙五十四年三月，西戎策妄阿拉布坦犯我哈密，皇上震怒，命諸臣分路進剿，又命冢宰富寧安總理軍務，總督川陝鄂，委州縣印官十三員軍前效用，並解買騾馬。寅亦在列。」<sup>16</sup> 出發伊始，張寅就懷抱宣力西陲的豪情，以此爲念，他在公幹之餘將一路聞見納入筆端，記錄「西陲風土、山川、疆域，以志平書萬里一統物無外之盛」<sup>17</sup>。在此後岳鐘琪等人的詩文中，自豪感愈加強烈，「萬里一統」之情成爲一以貫之的情感主線。其《沙洲》一詩，即極具代表性：

駐馬眺敦煌，重開古塞疆。沙寒春草白，風勁暮雲黃。瀚海分南北，天山界漢羌。玉門無內外，遐邇盡田桑<sup>18</sup>。

可以看出，作爲前人眼中「極西之地」的玉門關，在岳鐘琪看來已經無分內外了。他在《對月憶惜》中也有相同的表述：「蔽日旌旗出酒泉，春風幾度玉門還。」<sup>19</sup> 康熙初

13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0-551。

14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1。

15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1-552。

16. 張寅：《西征紀略》，《絲綢之路資料匯鈔（清代部分）》，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，1996年，頁49。

17. 張寅：《西征紀略》，《絲綢之路資料匯鈔（清代部分）》，頁63。

18. 岳鐘琪：《岳容齋詩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01。

19. 岳鐘琪：《岳容齋詩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03。

年，督學陝西的許孫荃遊歷河西，還曾感慨玉門關已經意味着中土極邊之地：「關到玉門中土盡，槎浮博望使星回。」<sup>20</sup>「莫道行邊人萬里，最西還有玉門關。」<sup>21</sup>短短數十年，清人的西域觀已經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。這不僅是出於「親歷者」對國家疆界的實際感知，更代表着由疆域延展而帶來的心態變化。

此處早已消失的玉門關只是一個滿載歷史意蘊西域意象，清人出塞的實際歷經之地乃是嘉峪關，所以它更為頻繁地出現在清初士人筆下：「風旋沙磧動，天接海雲浮，回首長安路，風煙萬里秋。」（岳鐘琪《嘉峪關樓》）<sup>22</sup>「自有車書通漠北，更逢干羽舞朝端。天山總在藩籬內，飛旆長驅縱目看。」（沈青崖《出嘉峪關》）<sup>23</sup>「五原據地猶居內，萬里營城遠在東。今日田廬平野闊，伊州車馬日匆匆。」（阿克敦《出嘉峪關》）<sup>24</sup>米華健認為，由於清代版圖在西北的延伸，「嘉峪關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名不符實的遺跡」<sup>25</sup>。從地理坐標來看的確如此，但從文學角度而言，嘉峪關至始至終都是清人邊塞認知的獨特心理坐標。特別是在康雍之際摒除外患、建構一統國家的時代情緒感染之下，嘉峪關理所當然地會被士人們作為今與昔、內與外對比的參照，並會在對比中獲得一種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的滿足，繼而打破前代「關限華夷」的狹隘。這從康雍時期的西域詩文當中就可以看出。

當然士人們的具體情感體驗會因時因人而異，每一個體的情感流變也複雜多樣。阿克敦在清準雙方休卒罷兵之際出使，詩歌中處處充斥著以「天朝」觀物的居高臨下感：「塵靜玉門來貢使，表通金闕又蒸黎。登樓莫獻籌邊策，聖主深謀靖勃鞞。」（《三月十七日進嘉峪關》）<sup>26</sup>「絕域皇華使，雙旌嶺外看。廿年兵事息，一詔遠人安。」（《和閣峰侍郎伊犁還旆原韻》）<sup>27</sup>，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的自豪之情在其筆下也表現得淋漓盡致：「帝曰普天之下皆赤子，雖在殊俗忍視歧，按兵不殺俟悔悟，予以自新一介馳，好生之德洽蒼昊。」（《準噶爾歌》）<sup>28</sup>

岳鐘琪詩作中所蘊含的心態變化與此又有不同。雍正八年九月，岳鐘琪回京面授方略，紀成斌護大將軍印，準噶爾部乘機犯巴里坤，紀成斌畏縮敗績。十年，廷議岳鐘琪失機，奪官交刑部拘禁，因以查郎阿接替其位。處在清準戰事最為焦灼的階段，久駐塞外的岳鐘琪也不免心生悵惘，在詩歌中投下情感波痕：

20. 許孫荃：《萬里》，《清詩別裁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383。

21. 許孫荃：《莊浪趨張掖》，《清詩別裁集》，頁383。

22. 岳鐘琪：《岳容齋詩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01。

23. 沈青崖：《寓舟詩集》卷四，葉四正一葉四背。

24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0。

25. 米華健（James Millward）著，賈建飛譯：《嘉峪關外：1759-1864年新疆的經濟、民族和清帝國》，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刊印，2006年，頁8。

26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2。

27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1。

28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1-552。

碧天如水暮愁生，月上牙旗分外明。小立卻沾霄露重，初更愈覺葛衣輕。風飄玉笛剛三弄，秋入陽關第幾聲。十萬健兒同掉首，一行鴻雁自南征。（《早秋塞上聞笛》）<sup>29</sup>

老去家何處，空聞醉有鄉。十年三出塞，百戰九征場。瘦犬窺鄰灶，饑鷄齧客床。寸心空戀闕，辛苦事戎行。（《夜宴諸將席散獨坐書懷》）<sup>30</sup>

前人評價岳鐘琪西域詩稱「公於軍旅之間，輒寄嘯於筆墨，邊塞諸作多慷慨悲歌之氣」<sup>31</sup>。在以上兩詩中，儘管有思鄉、有萬里從戎的苦辛，也還暗含着一絲對自身命運的隱憂，但詩作本質上並不衰頹。前首詩歌後半部分明顯化用李益《從軍北征》「天山雪後海風寒，橫笛遍吹行路難。磧里征人三十萬，一時回首月中看。」<sup>32</sup>語意相仿，卻沒有李詩中「行路難」的悲戚，說到底還是與清代初年國力强盛，國家處於上升期的時代特徵相一致。

### 三. 自然與地理感知的文學表現

西域獨特的自然與地理特徵，歷來都是相關文史敘述的焦點。清人對「五月天山雪，無花只有寒」（《塞下曲六首》其一）<sup>33</sup>、「北風捲地白草折」（《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》）的異域景觀定不陌生<sup>34</sup>，也具備一定的心理預期，但初至塞外的生命體驗與自然地理感知，仍然會帶給他們強烈的衝擊。如張寅《西征紀略》所述，剛出涼州，自然環境的反差就已經相當明顯：「出郭寒雨刮目，遙望天山，如群玉浮空，寒光耀日，眾曰此昨夜雨中雪也，『天山雪後海風寒』，乃於中秋前遇之。……十五日，道憲何公邀賞月，為憶『秦時明月漢時關』之句，殊為悵然。」<sup>35</sup>遙望天山高聳，感受寒雨邊風，讓他對唐人邊塞詩所渲染的情境不由生發更加切實深刻的領悟。待出嘉峪關進入西域界面之後，實際景象又出人意料：

二十四日，四十里至赤金峽，峽中水聲甚急，林木蕭森，坐臥其下，毛骨俱悚。……三十日在橋灣阻風，晝晦，驛馬凍死百餘匹。人亦有手足僵直不能言者。夜深，風吹帳僕，人皆相枕而臥，晨起，見身埋沙中過半。十月初一日七十里，至黃蘆岡，荒崖岑寂，寸草俱無。……初六日八十里至馬蓮井，無草，水亦有毒，驛馬飲之多有斃者。初七日七十里至星星峽，無草，初八日五十里至沙泉，淘沙見水，一勺之多，無草。初九日六十里至苦水，水甚苦，隱沙中，不可

29. 岳鐘琪：《岳容齋詩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498。

30. 岳鐘琪：《岳容齋詩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498。

31. 《岳容齋詩集·總論》引李調元語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492。

32. 李益著，範之麟注：《李益詩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113。

33. 王琦注：《李太白全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），頁284。

34. 廖立箋注：《岑嘉州詩箋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），頁317。

35. 張寅：《西征紀略》，《絲綢之路資料匯鈔（清代部分）》，頁54-55。

多得，無草。初十日過戈壁，百四十里至鴿子煙墩，戈壁內水草俱無。是夜臥沙土中，月皎風寒，放眼平谷，千里一碧，四更至墩，入哈密界。綠草如洗，幸有水，亦苦惡不可食<sup>36</sup>。

張寅出關之路日後都成為內地通往西域的主幹道，但在其經行當日尚未安設台站，行人只能自備營帳，艱難的跋涉無疑加深了他對塞外苦寒的體會。《西征紀略》中對從哈密過松樹塘至巴里坤的途程聞見記述也生動真實：

過搭版二日，糧運始齊，拾枯松舉火，人臥火光中，飲湯啜粥，以蘇數日饑凍之苦。二十四日五十里入盤松嶺，進吐爾番界（筆者按，當為巴爾坤，即巴里坤），二十五日阻雪，雪山逼近青海。是日大雪，十峰如練，海風驟至，夫役露坐雪中，騾馬皆踞冰上。

「搭版」又作打班、達版，維吾爾語堙口之意。這段文字描述了翻越東天山時飢寒交加的苦辛。身處此冰天雪窖之中，張寅不禁作詩道：「海角風生萬壑悲，孤身臥病雪山陲。早知宦況今如此，悔不螢窗曉起遲。」<sup>37</sup> 傾訴其痛苦、驚懼甚至後悔之情。這種描寫帶有普遍性。如桐城方正瑗雍正甲寅年（1734）幫辦軍需時，所作系列嘉峪關詩中所寫：「塞外草木衰，日色慘不溫。雪積天山高，連轡出關門。咫尺景物異，遠望無煙村。沙堆埋白骨，掛紙誰招魂。但聞鳴鳴聲，駱駝鳴荒原。」（《出嘉峪關》）<sup>38</sup>「朝出關門去，露濕錦障泥。暮入關門來，邊月揚旌旗。青天低沙漠，陰雲垂四圍。軍壘多大嚼，生射黃羊肥。」（《入嘉峪關》）<sup>39</sup>「金鎖嚴關絕塞開，旅人趁興上樓臺。天山雪影浮空去，瀚海風聲卷地來。」（《嘉峪關登籌邊樓，望寧遠查大將軍入覲》）<sup>40</sup> 方氏之詩雖不如張寅所述具體，但也可由此感受到塞外蒼涼。再如沈青崖《大風行》中對西極狂風的描繪：

噫嘻怪哉，西極大風何從來，旋天吼地聲如雷，恐是騰蛇噓氣揭石磧，抑或號號虎振毛嘯陰霾，陸海擁潮沙作浪，赭煙結霧疏飛埃，巽二摩旛勢不息，大王逞雄鼓神力，萬鬼啾嘈各戲遊。空中噴激射江域，車騎狂奔自突沖，騾駝悲嘶如退鷁，行人蜩縮任搏扶，墮地無言口鼻塞，三十六旬陽烏闇，颶母推蕩妖蟆蝕<sup>41</sup>。

整首詩作一連用了十幾個比喻，如將突如其來的大風比作騰蛇噓氣和惡虎咆哮，給人帶來一種天昏地暗、沙石漫佈的感受。「大王逞雄鼓神力」一句，化用宋玉《風賦》中的故事：宋玉侍楚襄王游蘭台宮，楚襄王披襟當風，感到十分快意，因問「快哉此風，寡

36. 張寅：《西征紀略》，《絲綢之路資料匯鈔（清代部分）》，頁58-59。

37. 張寅：《西征紀略》，《絲綢之路資料匯鈔（清代部分）》，頁62。

38. 方正瑗：《連理山人詩鈔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286。

39. 方正瑗：《連理山人詩鈔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286。

40. 方正瑗：《連理山人詩鈔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285。

41. 沈青崖：《寓舟詩集》，葉五正一葉五背。

人所與庶人共者邪？」宋玉則回答：「此獨大王之風耳，庶人安得而共之！」此處以大王之風比擬西域風勢，想象生新。詩中的誇張之筆不僅使得整首作品風格排奐奔放，更將狂風令人望而卻步的氣勢描繪地真實可觸。不過，描寫塞外惡劣之景只是清代士人西域自然地理感知的表像。隨着他們對西域瞭解的不斷加深，塞外山川也由標籤化的荒寒可怖，變得更加綺麗多姿。丁棻的《山市》就是比較典型的作品。全詩描寫了巴里坤湖邊的海市蜃樓，詩人由山市的出現寫起：「祁連六月堆晴雪，赤日當天凍雲結。北面巨浸虎臂舒，漫漫道是滄溟穴。將軍幕枕百尺樓，書生冬曉樓上頭。北望山連數百里，枯槔指點煙雲浮。羲馭將升九霄紫，黯霧東迎半山起。千態萬狀頃刻間，傍人爲我說山市。」<sup>42</sup> 復以濃墨重彩塑造出山市變態萬狀之景：

初春山市在子丑，妖氛殺氣彌山川。往往西隅飛一縷，先爲蛇豕後虓虎。饑鷹瘦狗爭奔騰，魚鮐駢突散復聚。介然鐵騎從東來，髀髀腰弓莫可數。指日瞥從戈影回，卷風直使旌聲怒。恍聞擊鼓萬馬嘶，倡狂鳥獸皆禽虜。……春樹煙籠有萬家，家家禾黍兼桑麻。又化金城數千雉，繞城五色芙蓉花。晴旭熙熙曲阿上，散作祥光歸滄滌。別有餘霞蟠結成，紫府仙人白鶴髦。東向神京拜至尊，金盤甘露擎仙掌。

星漢先生認爲，由此詩中的「『妖氛殺氣』『蛇豕』『虓虎』『饑鷹瘦狗』『魚鮐駢突』」等字眼來看，明顯是指準噶爾軍的猖狂」<sup>43</sup>。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，此說不無道理。不過這些誇張的比喻，更是恰到好處地展現出山市風雲突變的奇詭。此詩想象之奇特、風格之宏偉，在整個清代西域詩史中都獨樹一幟。結束對巴里坤湖海市蜃樓景象的詳細刻繪，詩人一轉筆鋒，將情感抒發挽結到「革心革面備四藩，陽關烽燧一時了。萬年處處山海間，凝成鸞鳳青天曉」的希冀上。如此畫龍點睛之筆，讓西域山市、大漠狂風的奇幻與現實歷史背景緊密契合，相得益彰，爲自然之景增加了一段人文意蘊。

清代士人對西域感知深化的另外一個重要標志，是對實際西域地理的記載與考證，這在阿克敦的詩作中最爲突出。阿克敦是清代第一個深入西域腹地的士人，有機會感受到北疆地區的整體風貌。如《途中即事》「博大山前策馬來，邊笳一曲度聲哀。」<sup>44</sup> 其中「博大」指今博克達山，這是清人首次將這座塞外名山寫到詩中。《塔爾奇嶺》「雲滿陰山勢自橫，中通一嶺類關城。飛泉百道從雲落，亂木千重繞澗生。岩側有時難並轡，石欹無處不遮行。」<sup>45</sup> 首句陰山即塔爾奇嶺，俗稱果子溝，爲伊犁東門戶。這也是繼元代耶律楚材《過陰山和人韻》之後，描寫果子溝的第二首古詩佳作。最難能可貴的是，阿克敦還有意考證沿途地理。如《十一月十九日過陽關》所寫：

42. 《乾隆重修肅州新志》，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甘肅府縣志輯》，頁443。

43. 星漢：《清代西域詩研究》，頁52。

44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1。

45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0。



古人離別重陽關，西出於今過此間。只有頽城依亂草，更堪寒日下空山。千秋事業拋荒塞，萬里風塵老客顏。定遠勳名無片石，一杯清酒吊河灣。

詩下自注稱：「陽關之西有河，名瑪納斯，其流甚巨，南帶天山，北據瀚海，設關以此為險。」<sup>46</sup> 根據注語透露出來的地理環境可知，詩中的陽關並非漢代陽關遺址，而是烏魯木齊境內的陽巴勒噶遜。後出的《西域圖志》對此有所辨析：「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，以為陽關之舊者。殊不知陽乃回語，蓋謂新。而巴爾噶遜則厄魯特語，蓋謂城，亦非為關也。況烏魯木齊地在天山之北，揆其方位懸隔，奚啻謬以千里計耶。」<sup>47</sup> 「陽巴勒噶遜在縣治東三十里，舊說以為古陽關者，非是。」<sup>48</sup> 阿克敦顯然是將陽巴勒噶遜與歷史上的陽關混淆了。

在《宿烏魯木齊》一詩中，他又將烏魯木齊與西域輪臺地望相聯繫：

吐蕃界北有空城，西距陽關第六程。雪滿荒蕪連野闊，春回林木帶流清。戍兵自古需屯策，柔遠於今識虜情。欲向輪台尋舊址，萬山高聳一峰明<sup>49</sup>。

在本詩的姊妹篇《再用前韻》中，阿克敦對此問題做了進一步考證，該詩「重詢番語知名久，又見寒風積雪清」句下自注謂：「烏魯木齊者，番語種稻之所，因以名城，烏魯木以番者切之，則得輪字。」<sup>50</sup> 西域歷史上有兩個輪台：漢代輪台位於南疆，地當今輪台縣，清代名布古爾。唐代因襲舊名置輪台縣，為北庭都護府所屬，位於北疆，地望今尚無確指。漢輪台是西域重要屯田之所，由詩意可知，阿克敦是將漢代輪台張冠李戴給了烏魯木齊。他的這一認識影響頗為深遠，乾隆三年成書的《重修肅州新志·西陲全冊》中就延續此說。

乾隆二十年清朝平定西域前夕，乾隆帝曾明示前軍將領「凡準噶爾所屬之地、回子部落內，伊所知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，並漢唐所未至處，一一詢之土人，細為記載，遇便奏聞，以資採輯。」<sup>51</sup> 相關資訊「得之目擊，訪之土人，以及軍營之奏章，地方大吏之人告，靡不搜採」<sup>52</sup>。有目的的收集和考察西域史地資訊。可是在阿克敦所處的時期，清人對於西域的認知普遍還處在相對陌生的起步階段，無論考證玉關方位抑或輪臺地望，阿克敦都不得要領。但是他的這種探索意識，卻正代表了清代詩人渴望認知西域的態度，也反映出清代地理空間拓展對於詩歌創作的影響，為清代西域詩文由泛化、想象走向征實特質的創作轉變做出了有益的嘗試。

46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0。

47. 鐘興麒、王豪、韓慧校注：《西域圖志校注》（烏魯木齊：新疆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172。

48. 鐘興麒、王豪、韓慧校注：《西域圖志校注》，頁194。

49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1。

50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1。

51. 《清高宗實錄》卷四八二，第15冊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頁40。

52. 鐘興麒、王豪、韓慧校注：《西域圖志校注·凡例》，頁7。

#### 四. 西域風物尋繹和民俗關注

康雍時期西行士人西域感知及其文學表現的另一重要內容，是對西域獨特風物與民俗的關注，這一點與史事、自然、地理略有不同，它更偏重於文化的認知。自漢代以來，許多與西域相關的事物在史不絕書的接受、闡述中升華為西域象徵，成為滿載歷史意蘊和心理積淀的文化符號。所以當吳兆騫於順治十四年（1657）遣戍寧古塔時，儘管身在東北，也會情不自禁地想起「雁飛白草年年雪」「風雲不斷北庭沙」<sup>53</sup>。同樣，一些新的西域事物也出現在清初士人筆下，在日後的反復書寫中，它們逐漸超越了自身單純的物理特質，而具有了代表西域的名片效應。這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「南山松」和「紀功碑」。

先說南山松。清代從哈密至巴里坤途中必經「松樹塘」。《西域圖志》載：「松樹塘，蒙古語名招摩多。在奎蘇東南九十里，西距宜禾縣治一百六十里，是為縣東南境。南踰庫舍圖達巴，至南山口接哈密界。」<sup>54</sup> 松樹塘位於巴里坤南部，以漫山遍野的雲杉而得名，故此處松林又稱南山松。在清代西域詩文創作中，沈青崖的《南山松》詩首次描寫了這片松林。詩歌着重描繪了南山之松千變萬狀的姿態：

南山松，百里陰翳車師東，參天拔地如虯龍。合抱豈止數十圍，拜爵已受千年封。其間最老之古樹，或曾閱歷漢唐平西戎。山椒據險築營壘，牧夫樵采孫枝空。金戈鐵馬恣蹂躪，燎原不盡仍青葱。茯苓蟠其根，蒼鼠游其叢。鱗甲裹層冰，柯條撼朔風<sup>55</sup>。

如詩歌題下自注所說，沈青崖之所以會注意到南山松，也是出於軍營中戰備之需：「軍中醫院，推察藥性，採皮熬汁成膏，號曰『松齡』，以貽同志，因歌紀之。」故而詩人還記載了南山松渾身是寶的藥用價值：「剝取霜皮厚三尺，花紋繡蝕胭脂紅。宋斤魯削成異彩，軍城製作幾筵供。下餘木屑香且豔，清光亂沸霞光濃。更調乳酥入穹帳，臭味競與團茶同。養榮益胃滋臟腑，服食常覺精神融。玉華金液任君餌，願躡鹿皮仇季之仙蹤。」

沈青崖此詩對後人啟發頗多，在《南山松》以後的清代西域詩文創作中，描寫南山松樹成為常見內容，且主題多樣。各類著述中對之多有記載，如《清稗類鈔》所述：「由伊吾至鎮西，路漸上漸高。八十里至南山口，遍山積雪，終古不化，車馬視轍跡而行，否則陷入雪窖，竟至滅頂。兩崖多松林，夭者、矯者，皆棟樑材也。南山之北口，數十盤折而下。又二十里至松樹塘，則止宿處也。土人出售松皮，有厚至二尺許者，色若脂，脂文作雲霞回護之狀，好事者用作聯額，人都不識，洵稱異觀。」<sup>56</sup> 不僅過往文

53. 吳兆騫：《帳夜》，《清詩別裁集》，頁175。

54. 鐘興麒、王豪、韓慧校注：《西域圖志校注》，頁183。

55. 沈青崖：《寓舟詩集》卷四，葉七正一葉七背。

56. 徐珂：《清稗類鈔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），頁5859。

士把它作為案頭妝飾帶回內地，當地居民甚至也將其視作異物售賣。

再說紀功碑。康雍年間，清人在巴里坤地區先後發現《裴岑碑》《沙南侯碑》和《姜行本碑》一系列漢唐石刻<sup>57</sup>。《姜行本碑》原位於松樹塘附近，本地人將此碑所在地稱爲「庫舍圖達巴」，《西域水道記》謂「蒙古語庫舍，碑也，以嶺有唐碑，故名」<sup>58</sup>。張寅《西征紀略》描述了此碑的基本情況：

搭版上有勒功碑，其上橫書『唐朝』二字。文首有「昔匈奴」三字，又「詔使持節，光祿大夫」八字，「開國公吏部尚書」七字，「兩漢屯田之壁，移民之所居，麴文泰即其苗裔也」二十字，又有「揚旌塞外，振威西極」八字。末書「貞觀十四年六月吉旦立。」<sup>59</sup>

《姜行本碑》記載了貞觀十四年唐朝平定高昌戰爭的經過，其史事可與兩唐書《侯君集傳》《姜行本傳》相互參照。阿克敦《闕石圖嶺》亦詠及此碑：「綿亙幾千里，東西一幹長。嶺分寒燠候，書隔雁魚行。」<sup>60</sup>題下自注稱：「澗石圖者，番語碑也。嶺上有唐侯君集領兵十四萬西征之碑，而字已剝落，不成文矣。」《裴岑碑》後被運載豎立在東天山山頂，故有「天山碑」的別名。康雍之後的各類公私著述中對此碑多有著錄，尤其在嘉慶年間被收錄入《全唐文》後其名更加顯赫。而張寅一文系首次對碑文進行辨識，阿克敦詩則是對其最早的吟詠。

岳鐘琪《天山》詩則提及另外兩方碑刻：「玉門千里月，鹽澤一川雲。峭壁遺唐篆，殘碑紀漢軍。」<sup>61</sup>徐松《西域水道記》載，《裴岑碑》在「雍正七年，岳威信公於石人子獲漢碑，度之幕府。十三年撤兵，移置鎮西府城北二百餘步關壯繆祠西階下。」<sup>62</sup>位於哈密燠彩溝溝口的《沙南侯碑》的發現也與岳鐘琪有直接關係，《西域水道記》中記錄燠彩溝「舊名棺材溝，岳威信公改今名」<sup>63</sup>。他自然也親眼目睹過這塊漢唐合璧的天然石刻，所以會將此唐篆漢刻置入詩中。

隨着這些碑刻名聲漸著，幾乎每位文士都希望一睹它們的真容，特別是矗立在天山頂部的《裴岑碑》，由於坐落在通達東西的大道上，便於觀摩，久而久之，還圍繞著它產生出傳奇故事。乾隆初年畢沅至烏魯木齊途經此地時，即說「碑在松樹塘頂，用磚石

57. 《裴岑碑》一名「永和二年碑」，雍正七年在巴里坤石人子鄉發現，十三年移至巴里坤城；約略同時，清人在哈密南山口燠彩溝發現「永和五年漢碑」，別稱《沙南侯碑》《沙海侯碑》《伊吾司馬碑》。此碑是一塊漢一唐合體石刻。主體爲漢碑，側面被姜行本磨去部分碑文後重新勒文；《姜行本碑》原位於松樹塘，雍正十一年由查郎阿運至山頂。參朱玉麒：《漢唐西域紀功碑考述》，《文史》2005年第4輯，頁129-148。

58. 徐松著，朱玉麒整理：《西域水道記（外二種）》，中華書局，2005年，頁175。

59. 張寅：《西征紀略》，《絲綢之路資料匯鈔（清代部分）》，頁61。

60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0。

61. 岳鐘琪：《岳容齋詩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02。

62. 徐松著，朱玉麒整理：《西域水道記（外二種）》，頁182。

63. 徐松著，朱玉麒整理：《西域水道記（外二種）》，頁177。

封砌，禁遊人讀，讀之風雪立至。」（《訪唐侯君集紀功碑》）<sup>64</sup> 紀昀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也記載：「嘉峪關外有闢石圖嶺，為哈密、巴爾庫爾界。闢石圖，譯言碑也。有唐太宗時候君集平高昌碑，在山脊。守將砌以磚石，不使人讀，云讀之則風雪立至，屢試皆不爽。」<sup>65</sup> 對此描寫最詳細的莫過道光年間的方士淦，他在《東歸日記》中寫道：

二十里，由山腳十餘里折曲盤旋而至山頂，關帝廟三層，深岩幽邃，靈顯最著。旁有小屋，系唐貞觀十九年姜行本征匈奴紀功碑，自來不許人看，看則風雪立至。余丙戌九月過此，曾進屋內一看碑文，約四五尺高，字字清楚，不甚奇異。因廟祝云「不可久留」，旋即出屋。頃刻間果起大風，雪花飄揚，旋即放晴，幸虧未誤事。乃今年二月望前，伊犁領隊大臣某過此，必欲看碑，廟祝跪求，不準，強進屋內。未及看完，大風忽起，揚沙走石。某趨馬下山，七十里至山下館店，大雪四日夜，深者丈餘，馬廐官馬壓死者無數，行路不通，文書隔絕數日<sup>66</sup>。

從清初士人的客觀記述，到貫穿有清一代不斷的增值附會，《裴岑碑》勒石紀功的初衷漸漸被人忽略，取而代之的是被作為信史的全新民俗演繹。潛移默化中，清人對於西域地區的文化重塑也依託於這些典型風物逐漸完成。

除了單純的風物尋繹，康雍西行士人眼中的宏觀西域民俗圖景也異常別致。張寅《西征紀略》中對哈密聞見的詳細記載即是一例：

（哈密城）周十餘里，塗泥參差，上無雉堞，只東北二門，內無通衢，人家多穴居土處，器用只皮囊鐵釜盂。王府在高臺上，逼近北郭，中有樓，以上穀（土）為之，女牆始有磚。俗以十一月為盛暑，交易不用銀錢，以物兌換。男俱鬚鬣，直項凸目，皮冠紅頂，衣雜色布，紅綠者多，足著香牛皮靴，女垂發為髻，赤足，有力。衆以衣蒙首而行。亦有讀書者，字如蟲絲鳥跡。……刑法最輕為水牢，其上有剃去耳鼻舌者，最重為車裂，境內樹木交縱，多水田，近城五堡尤為膏腴，土產青稞、糜、大宛豆、瓜、葡萄、桃、秋果、沙棗、木棉<sup>67</sup>。

這段文字將康熙年間哈密的建置、民居、少數民族衣着容貌、刑法、物產進行了概括，簡捷而不失全面，文筆從容不迫。與詩歌相比，內容含量更加豐富。張寅作為因公務出塞的官員，還特別受到哈密維吾爾郡王的接待：

府門柏木為樞，有二人執雕，四人持挺立門外，內設木架，置木挺數十。過一橋，王出迎，面如傅粉，年可二十餘，貂冠錦頂，銀鼠頭黃紵衣，石青為裙，靴用香牛皮，金花為飾，入門一廳，有河流繞其後。廳平頂無脊，內懸角燈一，紗

64. 《畢沅詩集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577。按此詩所述實為《姜行本碑》。

65. 紀昀：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卷八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35。

66. 方士淦：《東歸日記》（蘭州：甘肅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34。

67. 張寅：《西征紀略》，《絲綢之路資料匯鈔（清代部分）》，頁60。

燈二，四面皆疏檣，地鋪花色毛毯。相見握手為禮，分賓主。王青墊紅心，賜伯爵，旁一喇嘛侍坐，傳通使至。吾輩請札薩安，王亦遂問好。問幾時到，運糧多少，又問系何處官員。通使一一轉達。王云我入朝時曾經過，遂獻乳茶，茶罷，面前各設緞褥一，上設葡萄、哈密瓜各一盤，盤皆用銀，使從跪進，頗有禮數，食畢，送至二門外作別<sup>68</sup>。

康熙三十五年，哈密首領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歸附清朝，隨後清朝在哈密推行札薩克旗制進行治理。文中述及所面見的札薩，即為當時的哈密王、額貝都拉長孫額敏和卓（?-1777），雍正七年晉封固山貝子。王府內部景象及相關禮儀，不僅讓張寅倍覺新鮮，而且相關記述也為清代文獻所僅見，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。

其他士人都從不同角度對哈密地域風俗進行過實錄。方觀承《從軍雜記》偏重寫哈密村落與人口：「哈密，古伊吾廬地，唐改伊州，與畏吾爾、土魯番皆為回回部，其俗以白氈纏頭為貴酋禮服，故通稱纏頭。自哈密西至土魯番城八百里，又西約三千里，核其境土庫察城、阿克蘇城凡十數處，一城多至萬餘家。其人循分，務耕作錦帛，略如內地。」<sup>69</sup> 方正瑗《哈密瓜》主要寫特產：「西出嘉峪關，築城收哈密。枯田多種瓜，異域藤蔓結。六月天炎蒸，赤日焦毛髮。冰雪匪不涼，瓜味香沁骨。封疆貢物產，將秋帶霜折。青皮比噶玉，碧眼狀回紇。」<sup>70</sup> 阿克敦《哈密》側重記錄民風：「衣冠別蒙古，城市類中華。引水能知稼，分畦善種瓜。聖朝深護惜，村落有人家。」<sup>71</sup>

他們將西域民俗的敘述焦點集中在哈密地區，一是囿於時代條件的限制，暫不能深入新疆全境。二是由於哈密乃入疆首站，自古以來備受重視。無論如何，這些記述都迥異於以往志書單列地理沿革與區域建置的模式，使得西域民俗得到更為立體化的呈現。葛兆光先生說：「地理空間劃分與描述是政治、歷史和文化的結果，但是，地理空間反過來又是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標志。」<sup>72</sup> 以此衡量康雍西行士人對於西域民俗風物的關注與書寫，也正蘊含着大一統時代潮流下，主動打破地域與文化壁壘的正面意義。

## 五. 結 論

在清代之前也不乏親歷西域且以文著稱者，唐代的岑參和明代的陳誠就是典型。單就詩歌表現手法來說，康雍士人直接傳承了自岑參、陳誠以來西域詩的紀實特徵，但很明顯，隨着歷史情境的消逝和遠去，前人的創作又變為後來者瞭解西域的間接材料，它們不可避免地被模糊、異化，甚至成為一廂情願的想象。清初西域詩文則因為時過境遷的歷史變化，無論記錄史事、摹寫自然地理與風物民俗，無不展現着「當下」的西域風

68. 張寅：《西征紀略》，《絲綢之路資料匯鈔（清代部分）》，頁61。

69. 方觀承：《從軍雜記》，《絲綢之路資料匯鈔（清代部分）》，頁85。

70. 方正瑗：《連理山人詩鈔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286。

71. 阿克敦：《德蔭堂集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頁550。

72. 葛兆光：《宅茲中國——重建有關「中國」的歷史論述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），頁92。

貌。他們突破了從前代文獻中感受西域的局限，耳目所及、思緒所接，均來自於自己的直接體驗。既彌補了前代文獻記載的不足，豐富了西域詩的內容，也體現了清代詩歌「敘說時政，反映現實」和具有極強「敘事性」的特點<sup>73</sup>。

有論者認為，「實現了『大一統』的清王朝，疆域已不僅限於傳統概念上的中原。……以往那種以漢族統治區域為圓心、其他地區都是由此延伸出去的『邊遠』（或謂『邊緣』）的傳統觀念，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」<sup>74</sup>。這在康雍士人的西域感知與創作中就已現端倪了。雍正帝曾說：「自古中國一統之世，幅員不能廣遠。……我朝入主中土，君臨天下，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，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。」<sup>75</sup> 所以「內外無殊」幾乎是每個清初出塞士人的潛意識，他們的創作也與清代的西域經營進程同步。

總之，康雍時期西行士人親履西域的實地感知，從題材內容、情感表達以及藝術手法等方面，都為他們的詩文創作注入了諸多新鮮元素，使之成為清代西域漢語文學的拓荒之作，同時也突顯出西域邊疆自古以來就屬於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既定事實，這些都為乾隆朝西域平定之後，緊接而來的西域詩文創作高潮做出鋪墊並樹立了範式。 □

---

73. 周秦整理：《錢仲聯學述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90。

74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：《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》第3冊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300。

75. 《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3冊，頁300。